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社会

陈卓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上世纪末, 后现代主义思潮西学东渐, 来势汹汹, 波及到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 如今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思潮它已逐渐式微。进入 21 世纪以来, 后现代主义研究虽然比不上 20 世纪末那样“热门”, 但它在对中国的影响却没有减弱, 而是悄悄催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 结合中国实际, 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解读, 可以发现“异质的平等观”作为一种核心思想, 贯穿于后现代主义始终; 而“后现代思想批判”和“后现代生活”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两种基本状态。文化领域上的广袤性、理论体系上的零散性和历史时间上的交叠性, 是后现代主义的三大特点。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异质的平等观; “后现代思想批判”; “后现代生活”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5-0578-05

作为一种思潮, 后现代主义的高潮已经渐渐远去; 但作为一种生活态度, 它却悄无声息的在今天中国大众的生活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后现代现象, 有些领域甚至已经是典型的后现代了——关于这点, 从新闻的娱乐化上就可见一斑: 在内容上, 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是新闻的重点; 在表现形式上, 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 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 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1]。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 有必要对后现代主义的有关理论特点和它在中国社会的新发展进行重新审视。

一、

“后现代主义强调每个人之间的差异, 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 其核心思想似可归纳为: 承认异质的平等观。”^[2]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 平等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有意思的是, 以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面目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也十分强调平等的作用。但两者的出发点和重心却是不同的, 这种区别集中表现为后现代主义的“异质的平等”对现代主义的“同质的平等”的批判。这里的“质”就是指“本质”, 现代主义认为, 存在着本质和现象的区别, 本质是事物固有的、内在属性, 现象是这种属性偶然的、不重要的外在表现, 把握了本质才算了解了事物

本身, 人的认识就要从外到内, 由表及里、化多为一。与之针锋相对,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本质和现象的二元对立, 反对规律、原则、范式这类概念, 不论在认识历史事件、社会生活、人的行为, 还是在阅读、理解、解释文本时, 他们都反对这种深度模式。鉴于此, 他们在去中心、反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异质的平等说。因为只有同质的事物之间才有可比性, 异质则导致了可比性的丧失, 在他们看来, 丧失了可比性的平等, 才是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上下的平等, 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在现代主义同质的平等观的作用下, 好坏优劣是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我可以在人格上给予你平等的地位, 但从本质上说, 我和你还不是同一类人。我与你的平等是建立在我们本质上的不同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有人说的, “文人在诗化乡村, 商人在觊觎乡村, 官人在议论乡村, 只是没有人生活在乡村”^[3]。诗化乡村是一种艺术化, 体现出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乡村生活的向往; 觊觎乡村的, 是把乡村看作一个巨大的市场, 在这里, 一切东西都平等地呈现与金钱面前; 议论乡村的官人们未尝不是真心实意地为父老乡亲们生活操心。这些对乡村的态度, 都体现出了平等的姿态, 有的甚至还拔高了乡村(如诗人), 但诚如最后一句所讲的, “只是没有人生活在乡村”。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 其一, 这些人并不曾在乡村生活过, 所以不了解真正的乡村生活; 其二, 即使给一个机会

收稿日期: 2007-09-04

作者简介: 陈卓(1981-), 男, 湖南怀化人,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06 级秋季教育学原理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教育基本理论, 德育原理, 高等教育学。

让他们去乡村生活(非短期的“体验生活”),恐怕他们也不怎么乐意。今天社会大舞台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分化已不消再谈,仅仅就昔日“纯洁”的学校来看,“同质的平等”观的广泛蔓延和消极作用也已经十分明显了。作为“净土”的学校早已不再干净,这些年陆续出现的学校根据学生贫富状况分班级、分寝室、对号入座的事例就是明证。对此,有的人辩解说,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改革,给富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理所当然。

英国学者巴什勒提出“本体论上的平等”(ontological parity),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更具有实在性。这种看法与我国古代哲学家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是相通的,“本体论上的平等”与“异质的平等”在核心理念上是一致的,只是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罢了,它们均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后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利奥塔也提出“谬误推理”的概念,认为人类话语交往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和统一的标准,而是通过宽松的争论去发现悖论和错误,追求一种异质标准。这种观点从认识论角度对“异质的平等”观进行了诠释,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用差异哲学取代求真求同哲学的特点。

建立在“异质的平等”观的基础上,福柯明确指出,不应该提“同性恋”这样的称呼,因为这样的称呼总是让人想到同性恋这类人群与“正常人”有所不同,因而总是被看作另类:“我认为‘同性恋者’这个词已经作废了,因为我们关于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我们对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强加给我们的词汇限制住了。人既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我们称之为性行为的东西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范围。”^[4]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与异性恋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在古希腊时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那时候的人们,把男子间的性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根本无“同性恋”之说。中国古代对同性恋也是较为宽容的,但时至今日,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不平等反而越来越大。联系到国内著名性学家李银河因为提交同性婚姻提案招来一片哗笑、攻讦与谩骂,著名演员孙海英公开称同性恋是犯罪的惊人之举,可见现代主义的“同质的平等”观是何等强大,“异质的平等”观的确立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经历多长时间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二、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关注的重点应是在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用后现代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实际问题。问题在于,“当下中国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着难以置信的荒谬组合的社会,它有着从近乎远古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5](255)}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种种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相异、相左以至相对的理解、阐释和争论,就都不足为奇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像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瓦解一切、打碎一切、抹平一切,让这个世界变得颠倒、破碎、混沌而不可理喻,从而在“怎样都可以”(费耶阿本德语)的舞台上为所欲为、纵情狂欢。我们必须有所依附、有所执着,必须有所期待、有所超越。大致的出发点可能在于探讨缤纷芜杂的背后的共同的东西,——也许这不是“本质”,也不是“必然”,但它却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生活形式”基础上“家族类似”(维特根斯坦语),有了这种“生活形式”和“家族类似”,任何讨论才有可能。

诚如福柯所说:“借用康德的说法,我想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更多地当作某种态度,而不是某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想说的是对于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模式。这种对于现实的关系模式,是由某些人自愿作出的选择。同时,所谓‘现代性’也可以当作是思考和感觉的一种方式,当作是行动和举止的一种方式,它同时表示某种从属关系,并作为一种任务表现出来。所以,也很像希腊人所说的那种‘情感’‘德性’。因此,与其想把‘现代时期’同‘前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区分开来,不如更好地探索现代性的态度,探索现代性自形成以后,以及自从它同‘反现代性’的态度发生争执以后的那种特殊态度。”^[6]

福柯的意思是,态度上的差别比时间上的先后要重要得多,应当避开时间上的线性分类,以态度为标准,对“现代”与“后现代”进行划分。沿着福柯的意思进一步说,根据态度的不同,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即:“后现代生活”与“后现代思想批判”,用赵汀阳的话说,就是“后现代态度”和“批判的态度”。实际上用“后现代生活”与“后现代思想批判”更能清晰地阐明两者的关系。具体说来,前者是一种生存状态,后者则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状态。——前面所介绍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都是“后

现代思想批判”的产物。

“后现代生活”是现代性的过度发展,它继承了现代性的主要特点,并把它们发挥到极致。这样,终于造成了现代性的悖论,即“对于现代事物 x,你总能够按照 x 自己的逻辑,把 x 最终变成一种连 x 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东西或者使 x 变成一个悖论”^{[5](133)}。对于这样一种最终的非 x 的东西或者悖论,“后现代生活”并没有清楚的认识,而是沉醉其中,继续他们的狂欢游戏。前面所说的当今中国的新闻娱乐化倾向就是“后现代生活”的表现之一;而“后现代思想批判”则是对包括新闻娱乐化在内的“后现代生活”中诸多现象的批判和反思。两者的差别可以简单表述为:前者是置身世界游戏世界,后者是跳出世界反观世界。

套用赵汀阳的话说,“后现代生活”与“后现代思想批判”两者的精神气质和目的是非常不同的。那些“后现代思想批判”都是属于现代人文精神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像“后现代生活”是现代精神的一个变态或悖论表现。尽管“后现代生活”是不清不白的,但与批判却有比较明显的差别。有一个迹象是这样的:“后现代生活”不会真的去批判右派或左派,而是笑话它们,如果人们要求给出理由,那么它就笑话自己。

对于现代社会中具有“后现代生活”意味的种种现象,进行“后现代思想批判”的人会认真地进行反思和批判,——尽管这种认真有时是采取的“传统的”“学究式的”“正襟危坐的”方式进行的,有时是采取“新奇的”“调皮的”“戏谑的”的方式进行的;而处于“后现代生活”的人,则表现出极端的现实主义。对于现实,他们觉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他们不一定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其实他们对此毫不在乎,但却同意这句话的内容。对“后现代思想批判”者则表现出异常的冷漠:要么对此置之不理、不屑一顾,要么干脆给以无情的冷嘲的讥讽,取笑他们的不合时宜和不识时务。

后现代生活“并没有超越现代,而是现代对自身的悖论状态的自我表述”^{[5](130)}。这与利奥塔所说的“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是相一致的。所以,用“后现代思想批判”对“后现代生活”进行思考和批判,这正是今天的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在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和两种状态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其基本特点,从而对后现代

主义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有论者从七个不同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的内涵进行了界定^[7],在1994年召开的全国首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我国学者也提出了后现代的六种不同含义^[8]。通过对这些理解的分析,可以概括出后现代主义的三大特点:文化领域上的广袤性、理论体系上的零散性和历史时间上的交叠性。

其一,文化领域上的广袤性。这是从后现代主义涵盖的文化(广义上的文化)领域来看的。

这一点已经在理论上达到了共识。作为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科学观等诸多领域发生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的总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既涉及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指涉全球性的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变化,其覆盖面是相当宽泛的。后现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视野,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聚集了众多的思想派别,如新解释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分析哲学等^[9]。

正如詹姆逊所言:“‘后现代’就好比一个诸大的张力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最后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10]所以,企图用“后现代主义”这样的“主义”字眼来概括一个“复杂得难以说清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无疑有削足适履之嫌。

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先后推出了“后现代交锋”丛书,这套书计划出版25种,内容涵盖面相当广泛,既涉及到人文领域的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及其社会影响,如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拉康、鲍德里亚、乔姆斯基、萨义德、利奥塔、艾柯、巴特等人以及历史的终结、酷儿理论、心理分析、后女性主义、全球化、非人、历史书写等议题;也涉及到科学与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及社会影响,如爱因斯坦、霍金、道金斯、达尔文、弗洛伊德等科学家和与科学技术直接相关的库恩、麦克卢汉、哈拉维等人以及科学战、虚拟实在、基因改良食品、自私基因、大科学的诞生等议题。这充分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在文化领域上的广袤性。

其二,理论体系上的零散性。这是从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内部各个不同流派、学说的关系来看的。

正如白赖尔·麦黑尔所说,“每一个批评家皆从不同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构造后现代主义。”^[11]以至于有学者称:“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12]在后现代这个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大家庭中,混乱、分歧及至对立的程度是

令人惊讶的,经常让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所以,对于同一问题,出现截然相反的解答就不难理解了。

正因为如此,有论者说:“我一直以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标准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包括其表述方法、思维逻辑、师承关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都表现得犹疑不定,难以定位,以至于在我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大多数自我标示或被划归‘后现代’之列的论者,其实最终均无法把真正‘后现代’的原则贯彻到底,由此亦无法证明自己是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以至于我始终怀疑中国是否真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后现代’思想派别。”^[13]其实,这位论者所批评的“犹疑不定”“难以定位”“无法把真正‘后现代’的原则贯彻到底”“无法证明自己是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等“毛病”,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是它的诱人之处。如果能明确规定、能准确定位、能说清楚何谓“真正‘后现代’”和“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并能贯彻之、证明之,那倒反而不是后现代了。所以美国学者S·贝斯特、D·凯尔纳指出:“并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甚至各种立场之间连基本的一致性也没有。相反,通常被笼统地归并到一起的各种‘后现代’理论与后现代立场——它们彼此之间经常是冲突的——之间的差异,足以使人震惊。”^[1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从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否定性后现代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两个向度^[15]。前者的代表人物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费耶阿本德等,他们“总是毁灭他人已建筑之物”(哈桑语),侧重于对旧事物的摧毁,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因而带有否定主义、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罗蒂、格里芬、霍伊等,其最大特征在于建设性。面对现代哲学的危机,他们不是一味地否定,而是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重构世界“蓝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强调创造性、多元性,因而他们的哲学摆脱了否定主义的困境,带有较强的建设性、积极性和乐观主义倾向。还有人提出了第三种后现代主义,即庸俗的后现代主义,并认为它的代表人物是詹姆逊^[16]。

其三,历史时间上的交叠性。这是从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两者的关系的角度来说的。

交叠性一方面表现在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具体地说,它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的产物。利奥塔说:“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和现代性正相反的不是后现代,而是古典时代”^[17]^[154]。所以,“在我看来,散文(蒙田)是

后现代的,遗迹(雅典米纳瓦女神的庙宇)是现代的”^[17]^[141]。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吉登斯说:“那种主张现代性正在分裂和离析的观点是陈腐的。”他认为“后现代性”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18]。

诚如有中国论者所指出的,“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很显然,这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应对当今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挑战。”^[19]刘小枫也认为:“‘后现代’论述对现代性论述的攻击,实际成了现代性论述的一个激进的变种。”^[20]

交叠性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后现代性甚至可以在时间意义上超越现代性,也就是说,后现代性可以出现在现代性之前。美国最早对“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进行论证的思想家伊哈卜·哈桑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不确定的内向性”(indeterminance),他说:“我们每个人既可以带点维多利亚味道,同时又可以有现代主义,而且还可能带点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一个作家在他/她一生中,就可能写一部既是现代主义的、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品。”^[21]

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有人在另一个方向上做出的尝试同样是惊人的。由于不拘泥于时间的先后,后现代主义往往还能获得比现代性还要优先的特权。也就是说,在现代性出现之前,后现代就存在了。看来不可思议,但的确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刘长林提出:上世纪初期发生在中国的科玄论战是中国早期的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22]还有人走得更远:张建军认为《庄子》在反对崇高、解构神话、以边缘立场反对中心强势话语的统治等方面都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庄子》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原始天真对抗模式化世界,以人类精神解放为其终极目的的一种追求,它是通向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更为自由的境界^[23]。这正好印证了艾柯的话:“‘后现代’理论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渊源。”^[24]

参考文献:

[1] 林晖. 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1, (3):

- 30.
- [2] 刘复兴. 后现代教育思维的特征与启示[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4): 12.
- [3] 吴再. 怪味杂感[Z]. 杂文选刊, 2005, (2[下]): 18.
- [4] 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422.
- [5] 赵汀阳. 长话短说[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 [6] 冯俊. 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55.
- [7] 田薇. 后现代主义研究综述[J]. 教学与研究, 1999, (4): 43-44.
- [8] 杨文极, 李育红. 全国首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1994, (7): 46.
- [9] 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3.
- [10]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陈清桥.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432.
- [11] 林达·赫哲仁.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M]. 刘自荃. 台湾: 骆驼出版社, 1996: 12.
- [12] 波林·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张国清.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18.
- [13] 杨念群. “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J]. 开放时代, 2003, (3): 7.
- [14] 道格拉斯·凯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M]. 张志斌.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
- [15] 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21.
- [16] 王治河. 论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J]. 国外社会科学, 1995, (1): 45-46.
- [17] 谈瀛洲. 后现代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8] 大卫·雷·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代序)[M]. 王成兵.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0.
- [19] 陈晓明. 现代性: 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上)[J]. 社会科学, 2004, (1): 106.
- [20]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2.
- [21] 盛宁. 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6.
- [22] 刘长林.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2): 14.
- [23] 张建军. 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5): 66.
- [24] 艾柯. 诠释与过度诠释[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30.

Postmodernism and Chinese Society

CHEN ZHuo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postmodernism, as one element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 to China and made an impressive landing, which reached out to many domains of social life. Nowadays, postmodernism is attenuating as an extensive surge of thought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21st century, although not as hot as before, postmodernism still exerts influence on China, with intangible and brought about profound changes. Under new conditions, and combined with China's reality, this paper makes an effort to interpret postmodernism once again. The findings are: heterogeneous equality runs through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 thinking and postmodern life are two basic forms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in essence, postmodernism in existence, is culturally extensive, theoretically fragmentary and historically overlapping.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core; state; characteristics

[编辑: 汪晓]